

五十年后的掌声

文 陈泰龙

那天,由玉翠园进南山绿道,在九华山路口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告牌,上面写着:“仿佛听到五十年后的掌声。”

虽是偶尔地抬头,却是“惊鸿一瞥”,心中涟漪阵阵。

做人做事,要对历史负责,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

否则,如何能听到五十年后的掌声?

“掌声”的对面是一片丛林。林子里的荠菜已经开花,由于错过了采摘的黄金期,只能寂寞地开着。有一男子站在高岗上拉手风琴,岗上都是树,他在树与树之间,也成了一棵树。

踩着林中的小路,我们步入了南山绿道,扑面而来的樱花林。粉红的花,成片地开着,似片片云霞在空中飘着。百花丛中人爱笑。一拨又一拨游人,竞相在樱花丛中拍照。瞧,那几位女子,刚才还是便装,此刻已换上旗袍,挨着樱花,冲着摄影师的镜头笑。

闲敲棋子静观花。生活有时需要踩着这样的节奏,完成一次放松的旅行。

穿着背心短裤的肌肉男,迎着晨光,跑在绿荫泻地的绿道上。打着团队旗帜的志愿红,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走,脸上充满阳光。那个位居“太守”的健身者,一改平时“治国理政”的严谨和持重,穿着休闲运动装,夫妻二人,大步流星,边走边拍,手机相册里留下了许多心仪的风景。噢,一位小朋友欢快地跑来了,她把绿道当成幼儿园的塑胶跑道了,跟在后面的爷爷奶奶只是开心地笑……

每年春节过后,绿道上都会迎来一次迎春长跑,参赛者是全市餐饮企业的掌门。曾经问过组织者、市餐饮协会会长吴荣生:何以乐此不疲?他说,初衷很简单,就是大家见见面,见证彼此安好,祝贺各自又向百年老店迈进了一步!

绿道。春天。餐饮人的愿望在这里得到尽情的演绎——拥抱自然、拥抱春天,朝着希望奔跑。

这就是南山绿道。漫步其上,乐山者可以乐山,乐水者可以乐水,心愿各有不同,但都愿能有所偿,各有归依。

我要把掌声送给绿道。我相信,这样的掌声,五十年后仍然可以听到。

南山是我们的骄傲。这种感觉要追溯到我的童年。镇江山多,但南山是令我向往的一座。每到春天,我们的春游多半选择南山,来一次仪式感满满的远足。彼时,南山是属于年轻人的。如今,绿道修到马路边,南山走进了城市,和南山来一次亲密接触,已成为生活的日常,再也不受年龄和时节的左右。

记忆的枝头,开着这样一朵花。作为早期的工业文明,南山曾经有许多采石场。随着社会的进步,它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政协委员发出倡议:停止南山开山采石。倡议书刊登在镇江市报上,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响应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。如今,南山深处,那些裸露的采石宕口依稀可见。所幸的是,这些宕口已掩映在苍松翠竹之间。我要为这数十年前的决策鼓掌。因为这决策,南山苍翠依旧,不仅是我个人的骄傲,更是城市的品牌。要长寿到镇江,镇江有南山,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宣传语。

仔细想想,身边能听到五十年后掌声的事不在少数。大市口建广场,拿出黄金地段,修建城市绿地,闹中取静,市民休闲多了一个好去处。市政府旧址建成袖珍园林,冠名“东大院”,每到清晨,打拳的、跳舞的,活跃在院内空地上。迈步中国式现代化镇江实践的新赛道上,市慈善总会全面提升“慈善助医”和“慈善助学”两个项目。助医方面,救助病种扩大,救助对象增加,单笔救助金额达30万元;助学方面,由原来入学一次性救助改为在校全学年救助,为困难家庭改变现状提供了有力支撑。去年,一位受助学子考取清华大学,生活从此有了新的希望。

这样想着,我已经来到绿道的一个僻静之处。眼前,是一片农田,一个老者正打理着农事,身后是参天的大树,悦耳的鸟鸣不时从枝叶间传来,真是天籁之音。

童年私塾琐忆

文 潘春华

私塾,亦称蒙馆、塾馆,是旧时民间流行的一种私有教育形式。新中国成立前,镇江的国立小学数量少,大部分城乡学龄儿童就读于私塾,富有之家则请塾师在家设馆授徒,称之为“请塾”。新中国成立那年,我刚5岁,曾在离家不远的一家私塾就读了一年时间,对童年时私塾启蒙生涯的那段记忆,仍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般。

塾馆位于正东路东头紧靠城墙,坐北朝南。塾馆西侧是一家杂货铺和几户住家,往右拐便是丁家巷(现划归中营街),再往北走一段就是中营(现改为中营街),当时我家老宅就在这里,离私塾不足一里路。塾馆东侧是一片农田,距老东门土城墙仅四五十米远。

那时,称私塾教书的叫“先生”或“塾师”,不叫“老师”。我就读的私塾先生姓罗,因此塾馆便以先生的姓命名,叫“罗氏塾馆”。听附近老人说,塾馆原先是一大族的祠堂,废弃了许久,被罗先生租用改作塾馆。塾馆前后共两进,仅用前进房屋教书,后进房屋闲着。

进入大门,两侧是厢房,为先生会客及书房用。正厅为大七架梁房,高檐口,三开间厅堂,十分明亮宽敞。厅堂窗子上有窗格屏档,下面雕有葡萄、莲子等图案。厅堂前有一方天井,天井西侧植有一株槐树,这里便是我们童年读书上学的场所。

大厅正中迎面墙上悬有一幅《至圣先师》孔夫子圣像,下方设有一张长方形条几,中间供奉着一块牌位,上书“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”五字,并设置香炉烛台。条几前便是一张大方教桌和一把太师椅,教桌上摆放着先生教书用的一摞摞线装书籍、纸张、毛笔、笔架、砚台、紫砂茶壶和“戒尺”。迎着大方桌有序地摆放着三排十多张小方桌和各式各样的凳子,小方桌供学童读书、写字用,每人一张,坐的凳子须自带,因此有长条凳、方凳、圆凳,形式不一。

塾馆教书的罗先生,五十多岁年纪,中等个子,额头宽阔,戴个眼镜,左腿有点跛,所以有个诨名“罗瘸子”。听长辈讲,罗先生家住在南门外大街附近,学识渊博,写得一手漂亮的颜体毛笔字。平时,罗先生总身着一件灰色长衫,端坐桌前太师椅上,紫砂茶壶不离手,严肃冷漠的面部表情让人望而生畏。学童们进塾馆时,先得向他鞠躬道好;新进来的学童第一次见面时,必须跪下给先生磕头,还要奉上红包。

记得1949年中秋节过后,二姐手提一张圆高脚长凳,领着我“罗氏塾馆”就读。见了罗先生,我磕了个头,二姐奉上红包。红包实际上就是塾金,按学季交纳,半年交纳两次。当时先生收塾金是以粮食计算的,每

学季每个学童约交一斗麦子或稻谷,也可交现金。如若中途退学,塾金通常不退。同去塾馆上学的还有童年的玩伴王传俊,他的课桌紧挨着我。塾馆内共有十一二个学童,都是男生,年龄参差不齐,最大的八九岁,我年龄最小。

私塾教学没有专门教材,设置的课程主要是认字、读书和写字。年龄不同,学习的内容也不一样。

学童刚进塾馆头两年都是念“字块”,所谓“字块”,即学童父母买来红纸,裁成2寸见方的方纸块,先生用毛笔在上面写上字,由学童学认。先从最简单的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,和一些常用的东南西北等字念起,每天教4个生字,第二天在先生面前熟练地读出来,然后再教4个生字,如此反复逐渐增多。

在私塾就读的头两年,一般能认一千多个字,之后便开始读传统书籍。在私塾读书,《百家姓》是“开蒙”读物,接着读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弟子规》等。先生念一句,学童跟着念一句。然后先生解释词句、文章内容。最后,先生摇头晃脑地把全文诵读一遍,再逐个让学童朗读。

写字是私塾中一门重要课程。写字分大楷和小楷,先从大楷学起,当时叫“写仿”,或叫“仿牌”。即旧时油漆店里卖的白漆底子红漆字的牌子,由学童用毛笔蘸上墨汁照红字描写。仿牌有八寸长四寸宽,上面写的总是这么几句:“上大人,孔乙己,化三千,七十二”“一去二三里,沿城四五家,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支花”等笔画简单的字,用水一冲还能再写,所以又称“水仿牌”“描红牌”,目的是为以后写仿纸打基础。练习小楷是先生用红小楷笔写在纸上,学生按红字描写,基本上每天写大小楷各一张,直到独立写大小楷并坚持练习。学童写得好的字,先生就在字上“圈红”,写得不好的字,先生便用红笔在笔画上更正。

旧时私塾没有星期天,也不放寒暑假,只有春节、元宵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大冬才放假,“罗氏塾馆”也是如此。因此调皮的学童们编了个顺口溜:“大冬大似年,家家吃汤圆。先生不放学,学生不把钱。先生放三天,学生把三千。”

过去,私塾上学上午和下午均不设课间休息。先生每次教课后,学生就读书或“写仿”。中间上厕所,先生教桌上有块“出入牌”,一面写的“入”,一面写的“出”。上厕所学生将牌子翻为“出”,回来时翻成“入”,如再有学生上厕所,必须等先上厕所的回来翻好牌子后,才能上厕所。记忆中,私塾的厕所设在马路对面农田内,地面上挖五、六个坑洞,用芦席一围便成简易厕所,实际上是一座露天粪坑,粪便每天由拾粪的掏走。

1949年4月23日,镇江宣告解放,人民政府开始逐步改造私塾,不断补充扩大国立初等教育。随后,私塾在镇江城乡逐渐消失,我也于1951年进入了镇江师范附属小学学习,接受了6年国家正规初等教育。

